

东北亚文化

# 朝鲜北学派的新华夷观解析

郑成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北京 100720)

[摘要] 中国传统的“华夷观”长期影响着朝鲜半岛, 朝鲜各朝代的封建统治者也以“小中华”自居。“尊华攘夷”、“慕华贱夷”是朝鲜人传统的文化观念, 这一文化观念严重影响了民族意识和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自进入清代以来, 朝鲜人自以为所谓华夷秩序大乱, 华夏文明之真传移到了朝鲜, 并因此而深感自豪; 同时, 自感传续华夏文明之真传的责任重大, 虔诚地维护传统文化, 唯恐有丝毫的亵渎。尽管当时由于地理大发现、西势东渐, 人类文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 但朝鲜卫道士们一直将中华以外的文明视为“夷狄”之货, 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在如此僵化愚腐的意识氛围中, 北学派的先驱洪大容率先提出了“华夷一也”的新观念, 实现从“慕华贱夷”、“尊华攘夷”到“华夷一也”思想的飞跃。在东亚率先打破传统的“华夷观”是朝鲜北学派的一大特点, 在朝鲜唤起了民族主体意识, 为朝鲜学习世界先进文化, 吸收新的世界文明做了理论准备。

[关键词] 朝鲜; 北学派; 实学; 新华夷观; 洪大容

[中图分类号] B3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7411(2008) 06- 0098- (08)

[收稿日期] 2008- 08- 18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基金项目“中韩儒学文化交流史”

[作者简介] 郑成宏(1969- ), 女, 山东日照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研究员。

## 一、“北学”与“北学派”

北学派是 18 世纪后半期步入兴盛时期的朝鲜实学流派<sup>1</sup>, “北学”一语在朝鲜的传播和使用始于北学派思想家朴齐家。1798 年, 正祖向各道各郡征求关于发展农业的意见时, 时任永平县令的朴齐家将其出使中国的观感写成《北学议》献给了国王, 在序中, 朴齐家称其自幼时便羡慕唐朝进士, 故“辄随其俗之可以行于本国, 便于日用者, 笔之于书, 并附其为之利与不为之弊, 而为说也。取孟子陈良之语, 命之曰《北学议》。”<sup>[1]</sup>《孟子·滕文公章句》云:

“陈良乃楚国人, 悦周公仲尼之道, 北学于中国。”向北学习中国, 对于朝鲜来说或许是地理位置的巧合, 但是, 此后“北学”一词就表示向中国或西方学习先进文化的思想和学风。现代韩国学术界认为, 所谓“北学”就是指“朝鲜朝(即李朝)二十一代王英祖和二十二代王正祖时期, 提出接受清朝进步的文物制度和生活方式, 改良我国后进性的主张之学风。”<sup>[2]</sup>韩国学者对北学的特征进行了概括: “第一, 中小工商业者利益的代言人; 第二, 主张导入西欧自然科学, 进行技术革新以及开展海外通商; 第三, 消极被动地导入阳明学, 宣扬人间主体意识, 开展文体改革运

<sup>1</sup> 韩国历史学会编的《实学研究入门》一书对朝鲜王朝时期实学的流派及时期的划分作了明确的说明: “实学大体上分为三个流派: (1) 以星湖李瀼为主的经世致用派——此派重视土地制度和行政机构及其他制度的改革; (2) 以燕岩朴趾源为中心的利用厚生派——此派以商工业流通, 生产机构和一般技术的革新为目标; (3) 以阮堂金正喜为代表的实事求是派——此派以经书、金石及典故考证为主。”以上流派中的主导人物为准, 他们的形成时间为: (1) 实学的第一期是经世致用派(18世纪前半期); (2) 实学的第二期是利用厚生派(18世纪后半期); (3) 实学的第三期是实事求是派(19世纪前半期)。

动；第四，无视华夷差别，主张接受清学等。”<sup>[3]</sup>

所谓“北学派”就是“主张北学的实学的一派”。北学派思想家积极主张学习清朝的先进文化和传播到清朝的西方文化，因而具有开放性的文化意识。他们还极力倡导发展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工商业，主张扩大流通，发展城市手工业和农业生产，鼓励技术革新，因此北学派又称作“利用厚生”学派。<sup>[2]</sup>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上看，北学派的产生是朝鲜民族趋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北学派不仅在思想上呈现出共同的特征，而且在学术活动上也表现出思想流派的性质。他们通过聚会等各种形式开展学术交流，讨论学术问题，从而推动了北学派的发展，扩大了北学派的影响。

北学派著名思想家朴齐家在《白塔清缘集序》中回忆北学派初期的交流活动时写道：“环城而塔为中焉，远望嶙峋，若雪竹之迸笋者，圆觉寺之遗址也。往岁戊子（1768）、己丑（1769）之间，余年十八、九，闻朴美仲（趾源）先生，文章超诣，有当世之声，遂往寻之于塔之北，先生闻余至，披衣出迎，握手如旧，遂尽出其所为文而读之。……余惊喜过望，以为千古之晟事，为文以酬之，其倾倒之状，知己之感，盖如此。当是时也，炯庵（李德懋）之扉对其北，洛书（李书九）之廊峙其西，数十武而为徐（常修）氏书楼，又折而北东为二柳（柳琏、柳得恭）之居也。余乃一往忘返，留连旬月，诗文尺牍，动辄成帙，酒食征逐，夜以继日，……友人李君十三（李喜经）合书燕岩、炯庵诸公及余诗文尺牍若干卷，余为题曰《白塔清缘集》而序之。如此以见吾辈之游盛于当日，而且以自举平生之一二云云。”<sup>[4]</sup>从这段序文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与北学派学术交流活动相关的几个问题。首先，1768年至1769年间在汉阳的白塔附近已经聚集了一批北学派文人，并开展了学术活动，他们是朴趾源、朴齐家、李德懋、徐常修、柳琏（后改名为柳琴）、柳得恭、李书九、李喜经等。其次，在这些文人中间，朴趾源的地位显得尤为重要，由于他“文章超诣，有当世之声”而吸引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如朴齐家“遂往寻之于塔之北”。再次，《白塔清缘集》是由北学派文人李喜经编辑而成的。《白塔清缘集》的问世就意味着集结在白塔附近的一批文人的学术活动具有明显的流派性质和特征。朴趾源的孙子朴宗采回顾其祖父的学术活动及交往时说：“壬辰（1772年）、癸巳（1773年）间遂家眷归遗安翁石马乡，常独处于典医监洞寓舍，与洪湛轩大容、李姜山书九时相往还，而李懋官德懋、朴在先齐家、柳惠风得恭常从游焉。”<sup>[5]</sup>由此可见，朴趾源与洪大容、李书九、李德

懋、朴齐家、柳得恭等北学派重要人物交往甚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洪大容与北学派的交往关系是通过朴趾源为中介而建立起来的。18世纪50年代，洪大容在金元行的门下治学，当时朴趾源也经常向金元行求教，“曾骑牛谒美湖金公元行”，<sup>[5]</sup>他们可以说是同门好友，从那时开始就有了交流关系。1765年，洪大容随使节团来到燕京，与清代文人进行了广泛的思想文化交流，洪大容回国后，将笔谈交流内容整理成册，题为《会友录》（后改题为《干净同笔谈》）。《会友录》问世后，朴趾源为它写序，并给予高度评价。《会友录》在北学派文人中广为传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朴齐家读后说道：“及其此书，乃复忽忽如狂，饮而忘匙，盥而忘洗。”<sup>[6]</sup>1766年至1767年间，洪大容住在汉阳南部的暗里门，当时徐常修的另一寓所和朴齐家的寓所也在这附近，1770年洪大容为父亲守孝三年之后返汉阳，从此，与朴趾源、朴齐家、李德懋等北学派思想家的学术交流更加活跃。

有许多文学作品反映了北学派文人的学术交流活动，如李德懋在《观斋秋雨》<sup>[7]</sup>诗中的“同人文会”是指北学派文人的学术交流活动。

北学派文人的活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北学派的重要思想家如洪大容、朴趾源、朴齐家、李德懋、柳得恭等都来过中国，广泛地接触过清朝文人，甚至接触过西方传教士，使他们开阔了视野，改变了观念，对他们的北学思想和西洋观念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而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总之，以洪大容、朴趾源、朴齐家等为中心的北学派思想家以新的文化意识开展了学术活动，表现出一个思想流派的性质。

中国传统的“华夷观”长期影响着朝鲜半岛，朝鲜各朝代的封建统治者也以“小中华”自居。“尊华攘夷”、“慕华贱夷”是朝鲜人传统的文化观念，这一文化观念严重影响了民族意识和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自进入清代以来，朝鲜人自以为所谓华夷秩序大乱，华夏文明之真传移到了朝鲜，并因此而深感自豪。同时，自感传续华夏文明之真传的责任重大，虔诚地维护传统文化，唯恐有丝毫的亵渎。尽管当时由于地理大发现、西势东渐，人类文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朝鲜卫道士们一直将中华以外的文明视为“夷狄”之货，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在如此僵化愚腐的意识氛围中，北学派的先驱洪大容率先提出了“华夷一也”的新观念，实现从“慕华贱夷”、“尊华攘夷”到“华夷一也”思想的飞跃。在18世纪后半期，朝鲜北学派思想家就提出了“师夷长技”的思想，在东亚较早打破传统的“华夷观”是朝鲜北学派的一

大特点。他们反对事大外交和事大文化,为树立民族的主体意识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武器,在朝鲜唤起了民族主体意识,开发了蒙昧,为朝鲜学习世界先进文化,吸收新的世界文明做了理论准备。本文拟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朝鲜传统的文化观念“慕华贱夷”、“尊华攘夷”到北学派的“华夷一也”再到“师夷长技”之萌芽思想的演变进行梳理和分析,揭示其华夷观的历史意义。

## 二、儒家传统华夷观念的动摇

中朝两国自远古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就有着密切的关系。韩国学者认为:“给韩国(朝鲜半岛)影响最大的中国文化是儒教文化(儒学、政治制度——包括科举制度、教育制度和生活伦理)和通过中国传来的佛教。韩国从未摆脱中国文化的影响。”<sup>[8]</sup>中华思想与华夷观长期影响着朝鲜半岛,朝鲜各朝代的封建统治者也以“小中华”自居。建立朝鲜王朝的李成桂在一次上书辛禹王(高丽三十二代王)时说:“以小事大,保国之道。我国家统三以来,事大以勤。玄陵(恭慰王)于洪武二年(1369)服事大明,其表云‘子孙万代,永为臣妾’,其诚至矣。”<sup>[9]</sup>“尊华攘夷”、“慕华贱夷”是古代朝鲜民族传统的文化观念,其内涵是极端迷恋中国文化,蔑视并排斥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和民族。这一文化观念严重影响了民族主体意识和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

进入17世纪,汉译西学书不断输入朝鲜半岛,利玛窦制作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地图》在1603年(朝鲜宣祖三十六年)传入朝鲜。<sup>[10]</sup>新的地理知识对朝鲜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以中华为中心的传统世界观受到严峻的挑战,传统的华夷观也开始动摇。

首先对传统华夷观提出质疑的是实学者李瀾(1681—1763),他在论述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时说:“今中国者,不过大地中一土片,……大则九州亦一国也,小则楚亦一国也,齐亦一国也。”<sup>[11]</sup>这就是说,国无大小,皆是国家。所以,就中国与朝鲜来说,在“国家”这一概念上是平等的。就中国是中国、朝鲜是朝鲜的个别性来说,各国有其自己的特点。“东国自东国,其规制体势自与中央有别”。因此李瀾积极倡导研究祖国历史、地理,痛恨“今人生乎东邦,惟东事全不省觉”的蒙昧。<sup>[12]</sup>

在强调朝鲜是有自己特点的独立国家的基础上,李瀾进一步否定了传统的华夷观念,他说:“贵夏贱夷,为无义也。”<sup>[13]</sup>他还批判了儒家华夷观的理论根据即“天圆地方”的世界观:“曾子曰:如天圆而

地方,则是四角之不掩也。其意谓地球在天之心,不上不下,其周九万里,则其径三万里,地之心即天之心……今天在地上,都恰为一百八十二度半,则半天也,其无四角可知。”<sup>[14]</sup>

李瀾提出的域外圣人论又给华夷名分论一击,他说:“余每谓九州之内,宜不复生圣人,所待者九州之外,……今长城以外,其大不啻中国,其中岂无素夷狄行夷狄者,如圣人所指者耶。”<sup>[15]</sup>李瀾的学生安鼎福也批判了华夷之分:“自古儒者,每严华夷之分,若不生于中土,则尽谓之夷,此不通之论,天意何尝有界限。”<sup>[16]</sup>可见,李瀾和安鼎福对儒家华夷观的批判在当时有积极的意义,使长期统治朝鲜的传统儒家华夷观念发生动摇,有助于引起对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儒家华夷观念的反省。但是,他们还只是停留在怀疑、批判的层次上,还没有找到能彻底摧毁儒家华夷观的理论根据,也没有明确提出能取代儒家华夷观的新华夷观。到18世纪后半期,北学派思想家才真正解决了这一问题。

## 三、北学派先驱洪大容的新华夷观

### 1 洪大容的宇宙观

洪大容(1731—1783)依据自己的研究,推测出宇宙始初是一片茫茫之气。他说:“太虚寥廓充塞者,气也,无内无外,无始无终,积气汪洋,凝聚成质,周布虚空,旋转停住,所谓地、日、月、星辰,是也。”<sup>[17]</sup>这就是说,在宇宙形成之前充满着气,气凝聚成质,在不断地运动中逐渐形成地球、太阳、月亮和星星。根据这一宇宙本源说,他指出:“地者,水土之质也。其体正圆,旋转不休,停浮空界,万物得以依附其面也。”<sup>[17]</sup>他得出了“地圆地转说”,打破了传统儒学天圆地方、天动地静的陈腐观念。关于地球的运动,洪大容认为:“夫地块旋转,一日一周,地周九万里,一日十二时。”<sup>[17]</sup>他指的是地球的自转原理。但是,他还没有认识到地球在自转的同时也围绕太阳公转的道理。所以,当有人问及“各界俱转,亦能周包他界,独此地界只能自转,不能同行”<sup>[17]</sup>时,他错误地认为:“众界之成,体有轻重,性有钝疾。轻而疾者,转而能同行,重而钝者,转而不周。”<sup>[17]</sup>

可见,就当时传入朝鲜的西方天文学知识来看,“地转说”并没有传入进来,洪大容的地球自转理论,是他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科学研究得出的。这在当时较为封闭和落后的朝鲜,是一个巨大的科学发现。虽然洪大容的“地圆地转说”有些地方是错误的,但他对“天圆地方说”的否定却具

有哲学的意义,而且对实学思想家们,特别是对朴趾源等人的先进世界观的形成产生直接的影响。

洪大容否定传统的地球中心论,认为地球只是宇宙间无数天体之一,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他说:“满天星宿,无非界也。自星界观之,地界亦星界也。无量之界,散处空界,惟此地界,巧居正中,无有是理。”<sup>[17]</sup>他进一步指出:“是以无非界也,无非转也。众界观之,同于地观。各自谓中,各星众界。”<sup>[17]</sup>宇宙中充满了各自转动着的星体,从各个星体上看,它们都是宇宙的中心。故宇宙没有中心。洪大容在论证宇宙无限性的过程中,提出了“多银河系”的理论。他认为,传统所谓“天有两极”之说,是因为人们不明白地球是转动的道理。“天有两极,其实非天之极也,乃地之极也。”<sup>[17]</sup>天体是无限的,人们观测到的银河系只是众多天体组合体之一,地球、太阳是银河系之一星体,银河系又是宇宙之一星系,“地观之外如河界者,不知为几千万亿,不可凭我渺眼,遽以河为节一太界也。”<sup>[17]</sup>

洪大容不但认为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而且根据他对地球经纬度的研究指出,中国也不是地球的中心,他说:“今中国舟车之通,北有鄂罗,南有真腊。鄂罗之天顶,北距北极为三十度,真腊之天顶,南距南极为六十度,两顶相距九十度,两地相距为二万二千五百里是以鄂罗之人,以鄂罗为正界,以真腊为横界;真腊之人,以真腊为正界,以鄂罗为横界。且中国之于西洋经度之差至于一百八十,中国之人,以中国为正界,以西洋为倒界。西洋之人,以西洋为正界,以中国为倒界。其实戴天履地,随界皆然,无横无倒,均是正界。”<sup>[17]</sup>在此,洪大容以极为朴素的语言和事实说明了无所谓标准正界,各国各地方都各以自己的天地为正界。因此,自然界并无所谓的“中华”这一中心。如果说中华以自己的天地标准得出正界、中心论的话,那么,西洋各国也都同样可以各以自己的天地为标准得出正界、中心论。

洪大容的“地圆地转说”、“正界说”、“地球非宇宙中心论”和“中国非地球中心论”,为破除华夷内外之分的传统思想樊篱提出了坚实的科学依据。洪大容的宇宙天象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创见的,不乏深邃之处。<sup>[18]</sup>

## 2 “以天视物”的科学精神与新华夷观

洪大容从人与物的物质构成的角度提出,人与物皆是禀气而成,所以人与物无贵无贱。他认为,儒家学者之所以视人贵物贱,是由于人的“矜心”在作怪。所谓“矜心”就是人自我膨胀的意识,人自己标榜自己有仁义礼智的道德。在洪大容看来,如果说

人贵的原因在于其有道德的话,那么,物亦有。他指出:“以人视物,人贵而物贱,以物视人,物贵而人贱,自天而视之,人与物均也。”<sup>[17]</sup>

应该指出,洪大容“以天视物,人物相等”的观点,是针对朱子学者盲目夸大道德伦理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忽视现实事物而发的。他从人与物的自然构成上,肯定人与物都是大自然的产物是正确的,但他以物亦有礼义的观点来批判朱子学的道德至上论,则犯了自然神论的错误。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人与物的真正区别在于人可以制造工具,改造自然,物则不能。他的局限性是由于其所处时代决定的。

何谓“以天视物”?此“天”又是什么?在洪大容那里,“天”既非儒家之“道德之天”,亦非庄子消灭一切差别的“宇宙之天”,而是一种自然的而非伦理的,客观的而非主观的,开放的而非狭隘的科学方法论。韩国学者认为,“以天视物”的观点就是摆脱建立在儒教道德规范基础上的自然观,按照自然界本身的法则来理解自然。<sup>[19]</sup>根据这一方法论,洪大容把自然科学从朱子义理学的规范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一门重要的、独立的学术,并为自己从事于“天文、律历、算数、钱谷、甲兵”研究正名。亦是依据这一方法论,洪大容摆脱了传统儒学对天文学的穿凿附会,摆脱了“阴阳灾异”说的主观随意附会,以科学的、客观的态度研究自然科学,并取得硕果。同样依据了这一方法论,洪大容打破了朝鲜朱子学者“华夷之辨”的迷信,提倡国家平等,贵贱无差,在朝鲜历史上首次树立起了民族主体意识,也为后来提出向清朝学习的主张提供了理论前提。

洪大容继承并发展了李暹的域外圣人论:“孔子,周人也,……春秋者,周书也,内外之严,不亦宜乎。虽然使孔子浮於海,居九夷,用夏变夷,兴周道於域外,则内外之分,尊攘之义,自当有域外春秋。”<sup>[17]</sup>洪大容的“域外春秋”论脱离了朝鲜等于“小中华”的华夷论意识,既是唤起民族自尊的呐喊,又是给民族自大者沉重的一击。洪大容在给师友金钟厚之信中认为,夷狄之所以为夷狄,是因为无礼义忠孝,而且似禽兽爱杀伐,然而清朝因久居中国,其礼义忠孝或天性的行动方面与中国无异,故不能同意金钟厚将清人贬为非人之议,尤其是身为夷狄的朝鲜更不能称清人为非人。<sup>[20]</sup>由此可以看出,洪大容怀疑中华文化的绝对性,承认清文化之先进性。

当时在朝鲜正统卫道士眼里,清朝和西洋都是华夷秩序中近似于禽兽的夷狄,屈尊向夷狄学习可谓大逆不道。因此,在华夷名分论思想根深蒂固的封建朝鲜要心悦诚服地学习“夷狄”文明,必然伴随

着一场思想大革命。而正是洪大容的新华夷论思想,为这场思想大革命揭开了序幕。

华夷有别、内外有别的儒学名分论世界观的理论基础是“天圆地方说”。这种学说把大地看成是方的,在此方地中,中华置于中心,以此中心向外辐射,形成了所谓的“中华—夷狄(半人半兽)—禽兽”的层次。这是永恒的世界秩序。面对这种正统的世界观,洪大容大胆地予以挑战,提出了“地圆地转说”、“正界说”和“域外春秋”说等,推翻了“中华—夷狄—禽兽”这一思想结构的基石,通向“华夷一也”的思想大厦。对此,洪大容明确指出:“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也,凡有血气,均是人也。出类拔萃,制治一方,均是君主也。重门深濠,谨守封疆,均是邦国也。章甫委貌,文身雕题,均是习俗也。自天视之,岂有内外之分哉?是以各亲其人,各尊其君,各守其国,各安其俗,华夷一也。”<sup>[17]</sup>

洪大容在反对传统儒家华夷观,建立新华夷观,树立民族主体意识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韩国学术界对此作了高度的评价:“他(洪大容)的自然观正在克服以人为中心或以地球为中心的思维,但与此相通的是,他的社会观也欲摆脱以特定身份为中心的阶级意识,其历史观也摆脱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论’,而主张‘域外春秋论’。他确认了各国的相对自我中心论,从而提出了克服番邦意识、树立自主意识的根据。……他正在摆脱‘华夷论’,而在追求着自主的意识”。<sup>[21]</sup>

实现从“慕华贱夷”、“尊华攘夷”到“华夷一也”思想的飞跃,在朝鲜历史上有深刻的革命意义。这是因为朝鲜一直生活在中华文化圈中,深受儒教思想的熏陶。华夷之分、内外之分的名分论思想根深蒂固。同时,朝鲜人自感传续华夏文明之真传的责任重大,而虔诚地维护传统文化唯恐有丝毫的亵渎。这样,尽管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新的文化不断地崛起,但朝鲜卫道士们一直将中华以外的文明视为“夷狄”之货,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在如此僵化愚腐的意识氛围中,北学派先驱洪大容率先提出了“华夷一也”的新观念,使朝鲜从“小中华”意识的枷锁中解脱出来,唤起了民族主体意识,为朝鲜学习世界先进文化,吸收新的世界文明准备了理论前提。

#### 四、北学中国与“师夷长技”思想

如果说洪大容的“华夷一也”思想是建立在其研究基础之上的话,那么朴趾源和朴齐家(1750—1805)的中国之行,则使他们获得了产生新思想的养分,从而进一步发展了洪大容的新华夷思想。

朴趾源和朴齐家等出使燕京后,惊羨于清朝的繁荣和西洋的文明。对国内理学士大夫固守“礼论”、沉溺空谈以及社会生产落后、国家贫穷的状况痛心疾首。他们反思朝鲜之所以落后的原因时指出,国家要富强,民族要发展,就必须屏弃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学习清朝和西洋的文明。<sup>[22]</sup>

朴趾源针对当时朝鲜士大夫沉溺于朱子义理学,陷入“华夷之辨”、“崇明事大”而不能自拔,像洪大容一样,他积极宣传华夷平等的思想。在《热河日记》中,朴趾源说:“宇宙旷大,非一人之能专;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sup>[23]</sup>

朝鲜两班统治阶级把清朝蔑视为夷狄,而把维护孔孟之道的朝鲜称为小中华或中国文化的正统继承者,同时,扬言在削发的夷狄之国没有任何值得学习的东西。对此,朴齐家撰《北学辨》一文,抨击了当时朝鲜士大夫。他写道:“下士见五谷,则问中国之有无。中士以文章为不如我也。上士谓中国无理学。果如是,则中国遂无一事,而吾所谓可学之存者无几矣。……余自燕还,国人踵门而请曰:愿闻其俗。余作而曰:子不见夫中国之缎锦者乎,花鸟龙文,闪烁如生,咫尺之间,舒惨异态,见之者不谓织之至于斯也。其与我国之锦布经纬而已者,何如也。物莫不然,其语文字,其屋金碧,其行也车,其臭也香,其都邑、城郭、笙歌之繁华,虹桥绿树,殷殷匍匐之去来,宛如图画,其妇人皆古髻长衣,望之亭亭,不似今之短衣广裳,犹袭蒙古也。皆茫然不信,失所望而去,以为右袒于胡也。呜乎,夫此人者,皆将与明此道,治此民者也,其固如此,宜今俗之不振也。”<sup>[24]</sup>可见当时朝鲜士人闭塞,不知外国情形。

朴趾源有感于朝鲜士大夫的闭塞、自大和无知时指出:“吾东之士,得偏于一隅之土,足不蹈函夏之地,目未见中州之人,生老病死,不离疆域,则鹤长写黑各守其灭,蛙井粉田独信其地,谓礼宁野,认陋为俭。……然其言曰:今主中国者,夷狄也,耻学焉,并与中国之故常而鄙夷之。”<sup>[25]</sup>朴趾源对这种保守华夷之分,又俨然以小中华自居,不耻与清为伍的迂腐教条和蒙昧不化的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指责和讽刺。他说:“此我较彼,国无寸长,而独以一撮之结,自贤于天下,曰:今之中国非古之中国也,其山川,则罪之此胜;其人民,则辱之此犬羊;其言语,则诬之此侏离。”<sup>[25]</sup>朴趾源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人是“善读春秋者”。但是,在他们百年不变的尊与攘之中,中国按其自己的历史发展了;朝鲜却没有进步。因此,朴趾源和朴齐家呼吁要“北学中国”。“北学派”一词就是从此而来的。

朴齐家将其出使中国的观感写成一书，取书名《北学议》，并于1798年将此书献给了国王。北学议即是北学中国之议论。在书中，朴齐家除了介绍中国的情况之外，还论述了学习中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应学习中国什么与怎样学习中国。他在书中写道：“苟利于民，虽其法之虽出于夷，人将取之。”<sup>[26]</sup>朴趾源在为朴齐家的《北学议》写的序文中也说：“苟使法良而制美，则固将进夷狄而师之。”<sup>[25]</sup>两位实学大师在这里呼吁只要有利于民，只要其制度先进，就应该向夷狄学习。这里显然提出了“师夷”之观点。随后，他们对师夷狄之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展开。

朴齐家在《北学议》中说：“昔赵武灵王，卒变胡服，大破东胡。古之英雄，有必报之志，则胡服而不耻。今也以中国之法而曰可学也，则群起而笑之。匹夫欲报其仇，见其仇之佩利刃也，则思所以夺之。今也以堂堂千乘之国，欲伸大义于天下，而不学中国之一法，不交中国之一士，使吾民劳苦而无功，穷饿而自废，弃百倍之利而莫之行，吾恐中国之夷未暇攘，而东国之夷未尽变也。故今之人欲攘夷也，莫如先知夷之为认。欲尊中国也，莫如尽行其法之为逾也。若夫为前明复仇雪耻之事，力学中国二十年后，共议之未晚也。”<sup>[26]</sup>显然，这里提出了“师夷长技”，并具有“制夷”之萌芽思想。中国的魏源（1794—1857）受鸦片战争的震动，于1844年编纂了《海国图志》，他在该书的序文中明确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在18世纪后期朝鲜“华夷名分论”十分猖狂之时，北学派思想家就提出“师夷长技”思想之萌芽，可谓是较有胆识的。

北学派“进夷狄而师之”的具体内容，就是要学习中国清朝和西方“利用厚生”的先进技术和方法，以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利用厚生”始见于《书经》“大禹谟”篇：“禹曰：于帝念哉。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历代儒学者都把正德作为教化人心的首要之手段。至宋儒，由于理学家把主要精力用于形而上的哲学思辨，从而使道德驾空于“利用厚生”之上。在朝鲜，由于朱子义理学被统治阶级当作其维护封建秩序的手段，成为绝对的权威，“正德”越发成为士大夫们津津乐道、以博取功名利禄的“护身符”。而“利用厚生”却被当作小道和末技。如此偏废给朝鲜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带来巨大损害，导致社会发展的停滞。

朴趾源勇敢地站出来，打破这一传统的思想体系，给它来个头尾倒置。他说：“利用然后可以厚生，

厚生然后正其德矣。不能利其用而能厚其生，鲜矣。生既不足以自厚，则亦恶能正其德乎？”<sup>[27]</sup>明确指出了经济是道德的决定因素。这不仅是对当时的理学崇虚之风的根本改造，也直接关系到把“利用厚生”作为学术方向和目的之实学学风的确立。因此，北学派又叫“利用厚生”学派。

朴齐家也明确地提出了学习清朝的“利用厚生”技术和方法来强国富民。他说“善理财者，上不失天，下不失地，中不失人。器用之主利，人可一日，而我或至于一月。二月，是失天也。耕种之无法，费多而收少，是失地也。商贾不通，游食日众，是失人也。三者具失，不学中国之过也。……今我国如庆尚者八，而平时颁禄，人不过斛，敕使一去，经费荡然。升平百余年，上不见有征伐巡游之事，下不见有繁华奢侈之俗，而国之贫也滋甚，何也，此其故可得而言也，人种谷三行，而我二行，则是以方千里而为方六百余里也。人耕一日得谷五六十斛，而我得二十斛。则是方六百余里而为方二百里也。人播谷五分，而我十分，则是又失一年之种也。如是而有舟车、畜牧、宫室、器用之法，废而不讲，则是失全国之内百倍之利也。横计于土地也如此，则竖计于百年，已不知其几矣。失天、失地、失人，虽地方千里，而实不过百里。……今急选经纶才技之士几十人，杂于使行稗译之中，经一人领之，如古质正官之例，以入于中国，往学其法，或买其器，或传其艺，使颁其法于国中，设局以教之，出力以试之，视其法之大小与功之虚实，以为赏罚。凡一人三入，三入而无效者，点之而改选。如此则十年之内，中国之技，可以尽得。向之方千里者，始可以方万里。向之三四年之谷，始可以一年而得之矣。若是而财赋不足、国用不裕者，未之有也。夫然后虽人服锦乡、户设金碧，将与众乐之不暇，亦何患乎民之奢侈也。”<sup>[28]</sup>

朴齐家在反思朝鲜落后的原因时愤然指出，国家要富强，必须破除“四欺”和“三弊”。所谓“四欺”，是指国之自欺、士大夫之自欺、功令之自欺、习俗之自欺。朴齐家指出：“臣闻，明者不自欺，智者不自弊。夫人才之渺然而不思所以培之，财用之竭而不思所以通之，曰世降民贫。此国之自欺也。位愈高而视事愈简，居官委下属，出疆委众胥，左拥右扶，曰礼而不可稍越也。此士大夫之自欺也。桎梏于疑义之林，消磨于骈丽之途，束天下书而不足观。此功令之自欺也。你不呼父者有之，兄不呼兄者有之，同堂之亲而相奴者有之，……犹沾沾骄天下而夷之，自认为礼义也、中华也，此习俗之自欺也。”<sup>[29]</sup>“四欺”实际上就是自欺欺人风气的具体表现。朴齐家

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四欺”的社会心理一旦成为定势,必然割断人与外界的联系,钝化思想意识,削弱走向外界的欲望,使国家与社会不能向前发展。所谓“三弊”,是指“夫士大夫国之所造也,然而国法不行于士大夫,非自弊乎?科举者,所以取人也,取人由科而坏,则非自弊乎?书院而俎豆者,所以崇儒也,而捕丁禁酿,依焉非自弊乎?”<sup>[29]</sup>士大夫、科举、崇儒本来是李朝统治的三大法宝,维护着李朝封建统治机器的正常运转。然而,两班的绝对权威和世袭制造就了一批为所欲为的官僚。科举以浮文和八股取士,失去了选贤举能的真谛。儒家学说被捧为权威,走向了形式化和空泛化的绝路。为了破除“四欺”、“三弊”,朴齐家呼吁士大夫多读中国书籍,多与外界交往,以扩大自己的眼界。他还积极倡导通过商业往来,实现文化思想上与外界的沟通。这表明,朴齐家认识到了文化与观念的改变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地位。这是他的独到之处,因为文化思想观念的变革,比单纯的经济、政治变革又前进了一步。

需要指出的是,北学派思想家主张向中国学习,并不是要盲目地照搬中国的一切事物,他们在中国旅行时,也是用批判的眼光来观察事物,明确地分开哪些是应当学习的,哪些是不必学习的。朴趾源一进入中国境内就遇到了一些原在爱刺河戍边,后雇人代替而自己返回来的人。他看见这些人“皆骑小驴,帽服褴褛,容貌疲残”,心想:“东方则诚无虑矣,然中国边备可谓疏矣。”<sup>[27]</sup>又如,当他看到汉族妇女缠足时说:“以跟踏地行如种麦,左摇右斜,不风而靡,……貌样不雅,行步不便。”<sup>[30]</sup>

所以,北学派思想家主张批判地学习中国及至西洋先进的生产工具、科学技术和“利用厚生”的方法与措施。学习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使祖国富强发达的手段。北学派思想家是站在自主的立场上努力学习外国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其目的是要改变朝鲜落后的面貌,促进朝鲜社会的文明开化。所以“北学”精神是开放性与主体性的辩证统一,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在文化思想上首次确立了民族的主体意识。美国学者徐大肃说:“如果要问韩国民族的固有思想是什么?那么,还真难找出那种思想。其原因之一,就是韩民族(指朝鲜民族——引者注)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培养独立的思想,一贯受容外来思潮的缘故。据说,韩国也曾有过民族固有的思想。但是在引进佛教后的一千多年里,异民族的佛教和佛教思想对韩国的统治阶层和政治、社会各阶层起了决定性的影响。朝鲜王朝时期五百年间,虽然佛教衰退,儒教和儒学占

据支配思想的宝座,但是,这也不是韩民族固有的思想。”<sup>[31]</sup>显然,朝鲜半岛长期处于中国文化或中国化了了的文化的绝对影响之下。由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在文化观念上,没有也很难形成民族的主体意识。但是,从17世纪以后,这种状况逐步发生了变化,“西洋之通中国,盖自利玛窦始也。”<sup>[32]</sup>由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染指东方,产生于东方本土的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新的文明也在崛起,北学派思想家经受了“西风东雨”的洗礼,吸收东西方的文化养分,终于建立了“北学思想”体系,从而改变了这一局面。北学派思想家坚持独立自主而不固步自封,对外开放而不崇洋媚外,既以自主的立场肯定民族文化和宏扬民族精神,又以开放的姿态学习和吸收中国清朝的优秀文化与文明。

## 五、“华夷”观念演变的意义

朝鲜李朝后期,一方面由于朝鲜偏于一隅,成为中国的藩属,被正统的中国儒学者称之为“夷狄”,使得深受儒学影响的朝鲜学者禁锢于“华夷”名分的枷锁,产生民族自卑感。另一方面,随着明朝灭亡,清军入关,朝鲜士大夫又俨然以儒家正统的继承者自居,视清为夷,不齿于同清朝交往,产生了民族自大主义。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洪大容、朴趾源、朴齐家为代表的北学派思想家吹响了向儒家“华夷”观宣战的号角。洪大容根据自己的科学研究指出,地球非宇宙中心,中国非地球中心,从而摧毁了“华夷”之分的立足之处。又以“以天视物”的科学精神提出了“华夷一也”的光辉思想,唤起民族自尊心。朴趾源、朴齐家“进夷狄而师之”的理论又给予民族自大者沉重一击。有学者污蔑北学派主张向北方的清朝学习,是对明朝的背信弃义,而且也忘了朝鲜受过女真族侵犯的耻辱,北学派是对清朝的另一形态的事大主义者。<sup>[33]</sup>这是明显的歪曲,因为朴趾源和朴齐家主张向清朝学习的目的是要实现民富国强,这正是爱国的表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学者认为:“北学论同阻碍我国繁荣富强的封建制度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一种以自主的立场研究和吸取外国先进科学文化的爱国思想,在当时条件下有进步意义。”<sup>[34]</sup>

北学派从“尊华攘夷”到“华夷一也”再到“师夷长技”,完成了朝鲜历史上“华夷”观念演变的三个阶段。在当时唤起了民族的自尊和自强,摧毁了民族虚无主义和狭隘自大思想的基础,在思想上使民族的主体意识与开放意识实现了统一。它给当时的

朝鲜人们提出了新的方向,就是为了国家富强,为了抵抗外来侵略,而向中国和西方寻求真理的思想方向。这一新思想的提出,确立了北学派在朝鲜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 参考文献:

[ 1 ] 《贞蕤集》,《北学议·北学议序》。  
[ 2 ] 〔韩〕新国语大辞典 [ Z ]。三省出版社, 1977- 02 - 10(增补四版): 1547。  
[ 3 ] 〔韩〕刘明钟. 韩国思想史 [ M ]。以文出版社, 1992 499  
[ 4 ] 《贞蕤集》,《贞蕤文集卷五·白塔清缘集序》。  
[ 5 ] 朴宗采.《过庭录》卷一。  
[ 6 ] 《贞蕤集》,《贞蕤文集卷四·与徐观轩常修》。  
[ 7 ] 《青庄馆全书》,卷之九,《雅亭遗稿一·观斋秋雨》。  
[ 8 ] 〔韩〕全海宗. 中韩关系史论集 [ C ]。全善姬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21  
[ 9 ] 《高丽史》卷 113《崔莹传》。  
[ 10 ] 〔韩〕李元淳. 朝鲜西学史研究 [ M ]。一志社, 1986- 12- 15: 54  
[ 11 ] 《星湖僊说类选》卷 2《天地门》,“分野”条。  
[ 12 ] 李甦平. 中国·日本·朝鲜实学比较 [ M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5: 228  
[ 13 ] 《星湖先生文集》卷 15《答安百顺问目》  
[ 14 ] 《星湖僊说类选》卷 1 上,《天圆地方》  
[ 15 ] 《星湖先生文集》卷 15《答安百顺》  
[ 16 ] 安鼎福《顺庵集》卷 2《答上星湖先生书》(戊寅)。引自李润和. 中韩近代史学比较研究 [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4: 52

[ 17 ] 《湛轩书》内集卷 4《医山问答》。  
[ 18 ] 李英顺, 金成镐. 试论洪大容的实学思想 [ J ]。东疆学刊, 2006 ( 1 ): 36  
[ 19 ] 〔韩〕琴章泰. 北学派的实学思想 [ A ]。载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精神文化》第 10 号, 1981: 44  
[ 20 ] 李润和. 中韩近代史学比较研究 [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4: 53  
[ 21 ] 〔韩〕韩国哲学学会. 韩国哲学史 (下) [ M ]。东明社, 1992 125 126  
[ 22 ] 李 虎. 近代东亚三国西学成因及其比较 [ J ]。东北亚论坛, 2007, ( 1 ): 122  
[ 23 ] 《热河日记》,《罗约国书》。  
[ 24 ] 《贞蕤集》,《北学议外编·北学辨》。  
[ 25 ] 《燕岩集》卷之七,《北学议序》。  
[ 26 ] 《贞蕤集》,《北学议外编·尊周论》。  
[ 27 ] 《热河日记》,《渡江录》。  
[ 28 ] 《贞蕤集》,《北学议外编·财赋论》。  
[ 29 ] 《贞蕤集》,《贞蕤文集卷三·丙午所怀》。  
[ 30 ] 《热河日记》,《太学留馆录》。  
[ 31 ] 徐大肃. 韩国的政治思想和民族意识 [ A ]。载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 韩国学论文集 (第四辑) [ C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5: 335  
[ 32 ] 《热河日记》,《黄图纪略·天主堂》。  
[ 33 ] 金明河. 燕岩朴趾源 [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3: 87  
[ 34 ]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朝鲜通史 (上卷) (第三分册) [ 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73 915

〔责任编辑 李英武〕

## An Analysis on New concept of Chinese and Foreign of Korean North School

ZHENG Chen- hong

(Periodical Office of China Social Science, China Social Science Academy, Beijing 100720, China)

**Abstract** Chines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Chinese and Foreign has affected Korean peninsula for a long time. The feudal ruler of each Korean dynasty considered himself to be " a small China". "Respect of China and resist other foreign countries" and "admire China and look down upon other foreign countries" are traditional cultural concepts of Korea, and these concepts seriously affected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health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culture. From Qing dynasty, Korean thought that China was in total disorder and Huaxia civilization transferred to Korea. Korean was proud of it and protected traditional culture. At that time, Korean apologist looked down upon other foreign civilization except Chinese. As the pioneer of North School, Hong Dae- rong first put forward the new concept of " the equal civilization of Chinese and other foreign countries", whose ideas aroused Korea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made a mental preparation for Korea to absorb the advanced world civilization.

**Key Words** DPRK; North School; Practical science; new concept of Chinese and Foreign; Hong Dae- Yong